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大力扶植學術新人，是本刊宗旨之一。近年來，差不多每期都有數位正在攻讀博碩士研究學位的年輕學人在本刊發表文章，為本刊帶來新面孔、新視野、新氣象。去年本刊定為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期刊後，本刊來稿量大增，其中年輕學人的來稿佔了相當大比重。這都是可喜的現象。但我們也提請作者注意本刊稿約提出的若干原則，並盡量寫得更規範、更精練些。

——編者

台灣島，你將漂向何方？

在台灣「三二〇」大選前，拜讀了貴刊朱雲漢〈台灣選民的歷史抉擇〉(2004年2月號)一文，頗有感慨。假如台灣民眾真是基於一種理性判斷的基礎而選擇「泛綠陣營」，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他們選擇「泛綠陣營」就是意味着選擇了「兩國論」或者「一中一台」的論調。如朱教授所言，這至少表明他們是選擇了一個極力標榜以「去中國化」道路為主要基調的政黨。這樣，台海之間即使不會馬上陷入「烽火連三月」的「熱戰」之中，也必然要面對「翰海欄杆

百丈冰」的漫長「冷戰」僵局。因為「去中國化」意味着台灣當政者為着五十年的政治分歧而拋棄五千年的共有文化，這不僅對於中華民族而言，其實對於整個世界而言，對於整個人類政治文明而言，都是一個莫大而諷刺的悲劇。

我認為，應該始終牢記：溝通的姿態往往超越溝通的內容本身，假如歷史的偏見和傷痕不能在短期內「冰消雪融」，我們為甚麼不能給歷史放一個假期呢？讓時間來悄悄消融橫互於台海之間的這一彎窄窄的海峽呢？

我曾讀過小學課本中所描繪的這個美麗迷人的寶島台灣，現在，我要問：台灣島，你究竟要漂向何方？或許，正如朱雲漢所指出的那樣，這其實不僅僅是台灣選舉政治的產物，更是台灣民眾莊嚴而審慎的歷史抉擇。

侯興國 北京

2004.2.15

從抗衡到三邊互動？

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正如王家英〈抗衡多於順從〉(2004年2月號)一文所明示

的，對港台民主化的複雜過程而言，「中國大陸因素」均是其不得不面對的重要問題。王文認為：在選舉政治下港台對「中國大陸因素」的回應，是「抗衡多於順從」或「日趨傾向選擇抗衡而不是順從策略」。

雖然王文對港台從順從到抗衡之轉變的分析相當可取，但是，我認為必須首先明確的是選舉政治並非即等同於民主化。因此就筆者拙見，就研究論題而言，問題的關鍵在於：一是「中國大陸因素」是如何並且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港台之民主化而非其他？二是在選舉政治下，港台對「中國大陸因素」是如何並且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從順從趨向抗衡」的轉變？關於第一點，正如王文也明確指出的「中國大陸因素」並非反對香港的民主化步伐，同樣也並非反對台灣之民主化，它所反對的只是由民主化導致的台獨可能。關於第二點，港台對「中國大陸因素」的「抗衡」是作為民主化的重要內容、抑或僅是選舉策略，似乎應當有所深入與區別。

此外，作為「從順從到抗衡」對象的「中國大陸因素」，其本身也具有變與不變的特點，所謂變是指中國大陸因素現今也正經歷着民主化的進程，因而對港台的態度自然並非一成不變；而不變的則是在一個中國前提下對港台的主權訴求。忽然想到：如果說存在着順從與抗衡，為何不能三邊互動？

付海晏 武漢

2004.2.18

價值對事實的妥協性抗爭

讀完童世駿的長文〈論哈貝馬斯對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不同態度〉(2004年2月號)，我認同他對哈貝馬斯對於兩場戰爭所持立場的判斷，即，哈貝馬斯前後的立場是一致的，「哈貝馬斯是要進行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批判、要把批判理論推進到一個新階段」。不過，我認為哈貝馬斯在對兩場戰爭的批評和辯護方面，理論立場一致性的背後，是哈貝馬斯的價值性的政治關懷對無情事實的抗爭，它終究只能是妥協的、選擇性的抗爭，而對現代自由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現實政治決策機構的政治選擇，將是無力的。

何以如此？人和政治秩序如何才能和諧共存的問題，恐怕是所有政治思想家探討政治問題的起點。在古典傳統中，政治和美德的必然性聯繫是不用懷疑的；但自馬基雅維里以後，倫理(價值)和政治的兩分就成為一個現實，簡言之，政治的標準降低了。然而對價值理性的關懷恰恰是一個人成其為人的前提。因此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消解的結果，將如施特勞斯所關心的那樣：我們的世界還有沒有嚴肅的事情？人不得不生活在政治秩序中，現代性提供的秩序就是民族國家。

依筆者的看法，民族國家不僅是現代性的產物，也還是它的守護神，二者在結構上

是共生性的。由於這個關係，確如哈貝馬斯所言，現代民族國家是一個「理性的國家機器」，而且是自我關注的。工具理性和自由資本主義又是孿生的，資本具有侵略性，自由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也具有侵略性就很正常了。這意味着現代人基本上已經被非人化的秩序結構所支配，這個牢籠的確是鐵造的，人和現代政治秩序之間的矛盾是天然的結構性矛盾。

正由於現代性對人要做人這種努力的侵蝕是高度危險的，對現代民族國家政治進行反思的思想家，不得不面臨一個尷尬處境：承認現代性不可抗拒的前提，然後所作的就是盡可能地審察並試圖堵住現代性對人的存在有侵蝕危險的各個環節。也就是說，只能進行體制內的抗拒，因此它的力量注定是有限度的。盧梭以降各個時代大批思想家的努力可以說都是這種命運，我認為哈貝馬斯就是這個行列中的一員。這真是一樁悲壯的事業！

哈貝馬斯等理論家的努力，只能提醒人們對現實政治的複雜性和危險性保持足夠的警惕。戰爭這種可能涉及重組政治秩序的危險，是現代性最表象化、最集中的危險，在現代國際政治中由它造成的厄運隨時可能降臨到個體頭上。因此筆者認為，在現代國際關係問題上，增強國家的實力，也就是降低現代性對個體侵蝕危險的基礎部分，對價值普世主義的關懷過於強烈，恐怕容易麻痺自己。

袁賀 北京
2004.2.17

清華的另樣「歷史地圖」

從教育史的視角考察，對以「北大」、「清華」為首的若干高等教育個案的研究，恰恰是可能產生出學術生長點的好題目。

清華作為中國現代學統的重要源頭之一，尚未得到深入的挖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臧否清華〉(2004年2月號)一文選擇舊清華刊物，試圖探討「清華精神」，其立意甚可嘉也。張玲霞此文挖掘出1949年之前的《清華周刊》、《清華副刊》、《清華文藝》等校園刊物中的諸種聲音，就讀於清華的學子在這些刊物上試圖「臧否互見，錘煉出獨特的清華精神」。將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還原為清華園中的學子本色，諸如王造時、賀麟、陳銓等日後文化名人，他們畢業後在中國思想文化界的縱橫馳騁，原來有其濃厚的清華思想與教育背景。可不是嘛，他們早在大學生時期，就得以「議論風發」、「馳筆慷慨」，又怎能不培養出日後銳意進取、勇於發言的「致用取向」與「參政習慣」呢？這樣一種民主、自由的寬鬆氛圍，原來正是老清華的價值所在。

由此，文末將清華「定位」於現代大學的主旨，即四要點：民主、獨立、自由和創新，並分別闡述之，其立意雖好，但在文氣上似稍嫌突兀了些，與前文之史實列舉無「水到渠成」之感，這也可能是筆者求之過奢了。

葉雋 北京
2004.2.18